

从文化视角透析日本外交政策的战略选择^①

巴殿君*

内容提要:日本的近代史就是三对外交政策理念对抗的历史。小日本主义与大日本主义、民生国家与普通国家、国际主义与亚洲主义,三种理念此消彼长,构成日本对外政策发展的基本轨迹。制度化的法律规范文化因素制约了“大日本主义”与“普通国家”目标的实现,而作为构成性社会规范的集体认同正在形成有利于这一目标实现的社会环境。但在“亚洲主义”方面,构成性社会规范的集体认同,明显制约着“东亚共同体”外交目标的战略转移。可以说,文化规范既约束着日本对外政策的行为,也塑造着日本的外交政策的认同,并且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日本未来的外交政策的政治选择。

关键词:文化视角 外交政策 制度化规范 构成性规范 战略

一 制度化规范与构成性规范的文化视角

外交政策是国家总体战略的一部分,不仅包含着安全、政治与经济的内涵,也表现为长期的历史深层的民族文化的一面。现实主义理论重视国家权力、国家利益与国际均势,它在国际危机与冲突的关键时刻对国家的对外政策确实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无法解释历史中的国家外交惯性与长期习性;自由主义理论过分强调制度与机制的作用,但是忽视了一个国家外交政策中长期被文化塑造的独有的个性与特征;建构主义从集体身份认同和文化规范的角度去审视一国的对外政策,关注的是观念、认同的变迁。^②换言之,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的着眼点分别是权力平衡、制度设计与文化规范。

* 作者系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副教授。

① 本文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东北亚战略与政策研究”(项目批准号:09JZD0037)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朝鲜半岛政治经济走势与我国的半岛战略研究”(项目批准号:08JJDGJW262)的资金资助的成果之一。

② 参见刘鸣:《国际社会与国际体系概念的辨析及评价》,《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12期。

对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的分析, 如果将“理性”与“文化性”结合起来, 将会对行为体的选择作出更全面的解释。外交政策体现一种“薄”的基本性准则, 其背后的文化则表现出“厚”的约定俗成。文化与外交政策, 正如手决定手套形状一样。因此, 文化对外交政策某些特定方面的研究不仅有效, 而且由于文化的重要性与连续性, 对于外交政策具有不可替代的解释力。

美国学者彼得·J. 卡赞斯坦认为, 文化作为民族的集体认同的一种规范, 包含制度化规范与构成性规范。所谓制度化规范, 是指被制度化了的、明确表现出来的规范, 它是国家特有的, 一旦制度化, 就将存在于个体行为者之外, 代表一个国家整体的偏好、价值观与意识形态。这种规范转化为国内法规时, 就具有了约束力。而构成性规范, 表现为一个国家民众的集体认同, 也称作集体认同规范, 它表现出长期的习惯性与约定俗成的历史性。文化规范由各种不同制度化规范与构成性规范构成, 更多地表现为法律制度下的法律规范与历史习俗中的社会规范, 不同的法律规范与社会规范塑造着民族国家的权力形式与民族的集体认同模式。在外交政策的选择中, 文化规范规定着国家的对外行为标准, 塑造着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与对外行为模式。

战后日本发展起来的“文化规范”, 首先表现为制度性规范方面。这种制度性规范来自于国际规范与国内规范的双重特征。可以说, 日本的战败是国际规范(条约)转化为国内规范的历史基点, 而法西斯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对抗则成为其形成的逻辑起点。

具体而言, 二战结束, 日本作为战争祸首之一, 面临全面解除武装等处罚。国际社会通过《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国际条约, 意图清除日本军事扩张的军国主义, 并通过“和平宪法”的制定, 将上述国际条约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日本国内法律规范, 这种外来的压力将日本推向民主主义之路。其中, 宪法中“第九条”的规定, 成为防止军国主义不再重演的屏障。基于“和平宪法”, 日本又确立了“专守防卫”、不行使“集体自卫权”和“无核三原则”为核心内容的基本原则。这成为制度性法律规范的主要内容, 反映到外交政策上, 又成为日本制定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

这些“和平原则”, 不仅为日本战后的对外政策选择制定了“标

准”的模式，同时也为国民的集体认同（构成性规范）构建了广泛的和平主义的国内环境。绝大多数日本国民认可这种法律规范下的国家组织结构、政治程序与基本原则，将追求经济繁荣的目标置于军事目标之上。冷战时期，这种集体认同反过来又制约着企图修改宪法与发展军事力量的少数人的追求，军事扩张的欲望在和平主义集体认同的状态下被有效遏制。在这种广泛的和平主义集体认同下，日本达成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目标。正是这种制度性的法律规范与构成性的社会规范，建构了日本内部的安全，同时确保了日本的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实现。

可以说，制度化规范与构成性规范，既约束着日本对外政策的行为，也塑造着日本的外交政策的认同，并且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日本未来的外交政策的选择。但正如著名日本研究专家彭佩尔指出的：“日本最重要的盟国——美国，要比日本的所有可能的敌人的总和更能触发日本国内的外交政策、对外经济政策反映和国内争论。”^① 日本的外交政策，基本上反映了美国的外在力量与日本自我约束的和平主义理念。可以说，美国是日本制度化规范的文化因素形成的重要原因。

日本著名学者猪口孝认为，日本的近代史就是三对外交政策理念对抗的历史，即小日本主义与大日本主义、民生国家与普通国家、国际主义与亚洲主义，三种理念此消彼长，构成日本对外政策发展的基本轨迹。本文借用制度化规范与构成性规范相关的文化视角，通过经验层面与理论层面的论述，尝试对上述日本外交政策进行分析和更弹性的解释，期望达到更好地理解日本文化规范对外交政策的建构的目的。

二 小日本主义与大日本主义

（一）“和合文化”与“小日本主义”

“小日本主义”与“大日本主义”之争，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期。当时，日本思想家横井小楠提出“万国一体，四海兄弟”，成为“自然之势”，世界因为互通贸易而相互依存。各国应“敞开胸襟，通

^① 彼得·J·卡赞斯坦：《文化规范与国家安全》，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73页。

一体之交易”。^①这种主张和平通商的“小日本主义”的外交理念，后来却被主张追求军事霸权的对外扩张路线所替代。此后，日本吞并琉球、侵略台湾、殖民朝鲜，将军事扩张的“大日本主义”推向极致。直到战败后，“大日本主义”政策遭到沉重打击，日本才重新确立“贸易立国”的国家战略方针，“小日本主义”的政治理念又重新出现。^②

有些学者将小日本主义与大日本主义外交之争的原因归之于“和合文化”。所谓“和合文化”，是指在看似相互矛盾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合方面，日本人能够固守传统，又会逐渐地把外来文化融于自己本国的文化传统中，使两者都能成为日本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正如，和服与西装合于一体、和食与西餐同于一桌、佛教与基督教可以同时成为日本人的共同信仰一样，“和合文化”在对外政策上，也可反映出包容与和平的外交价值取向。但实际上，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与日本的和平主义爱好者的形象反差很大。以明治维新为界限，可以看出日本的“和合文化”表现出不同时期的历史文化特征。

在明治维新以前的两千多年里，日本的“和合文化”“融合”、吸收中华文化的内容，同时保持日本文化的传统，呈现出“内核—外缘”的构造。^③中华“主体文明”对于日本的“边缘文明”具有很强的辐射效用，反映到传统的日本对外政策，基本上是根据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秩序这个自变量的变化而变化。当然，由于日本处于这一秩序的边缘地区，加之大海相隔，使日本保持了对外政策的相对独立性。这一时期的“和合文化”，基本属于“小日本主义”范畴。从明治维新到二次大战，由于中国的迅速衰落，日本对外政策选择发生了巨大转变。日本试图通过“富国强兵”的对外扩张主义，建立一个既要摧毁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秩序，又要摆脱以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为核心的世界体系，但最终作为国家战略目标的“大日本主义”遭到惨败。

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是由该国的文化价值观所决定的。文化价值观转换的条件基于以下两条：（1）国际战略环境的外部剧烈变化；（2）

① 横井小楠「沼山对话」、「日本思想大系」55卷、岩波书店、1981年、502页。

② 武村正义在《虽小却熠熠发光的国家》一书中提出的“小国论”。该“小国论”继承了近代以来的“小国主义”传统，但这一理论在90年代未能占据主流地位。

③ 参见于桂芬：《西风东渐》，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8页。

国家政治的内部急剧变革。其中任何一个条件的变化，都可能影响到国家战略价值观的变化。按照历史学家汤因比的“挑战—应战”理论，在竞争性国际体系中，一国的对外政策的产生，必然服从于一定的价值要求。从历史与地缘政治视角来看，日本的对外政策的选择，一直是以中国与美国两个外因变量为依据的。从文化视觉来看，日本不同历史时期的“和合文化”作为日本对外政策的一个内因变量，构成日本对外政策变化的基本依据。

（二）美国内素与“大日本主义”的目标实现

经过战败的教训，日本由过去的军国主义转向和平主义。而且战后至今，日本确在和平主义的道路上一路走来。那么，如何看待这种非暴力的国家对外政策？由于历史、制度与环境的变化，战后日本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认同”。换言之，战后的“和合文化”来源于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的失败与日本本土所承受的“核打击”的历史记忆，来源于军国主义制度被取而代之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来源于日本宪法中的和平理念。也就是说，是历史、环境与政治制度发生变化等相关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正是上述“和合复合体”才重新创造出日本当今的“和合文化”的集体认同。换言之，这一时期的“和合文化”是制度化规范与构成性规范相互作用的结果。而这种结果形成的直接原因，是由于美国这一外在自变量发挥着强大的作用。

二战后，日本的国内与国际地缘政治格局都发生了巨变。由于美国的占领，日本成为美国霸权联盟中的从属伙伴。同时，美国主导下制定的和平宪法，又制约着日本重蹈军国主义道路。国际上，两极对立的冷战体系，使日本从属于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国际体系的力量结构之中，共同对抗对日本构成威胁的苏联。这一时期的日本对外政策选择，一直取决于美国这个强大国家的自变量。

冷战时期，日本接受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秩序的现实，在和平宪法的制度化规范内，推进贸易立国战略，“和平主义”成为当时保证日本利益最大化的手段。日本一直推行着这一精明的对外政策：与最强国家美国结盟，搭美国的便车，享受美国的安全保护，腾出精力发展本国经济。这种政策的结果，不仅使日本在战后迅速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而且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发展成为世界上名列前茅的军事强国。这种

精明的外交政策在于日本的军事选择并非“咄咄逼人”，其国家安全政策是在日美同盟特定的环境中，谨慎推进武器水平的提高，拥有了“普通国家”所拥有的军事实力。在“核问题”方面，日本遵守着“不制造、不拥有”的原则，“但它已经实际上成为一个核大国，具有威慑力量却不用生产核武器”^①。这种外交政策的精明之处，还在于遵守无核原则与专守防卫原则的日本给国际社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本不愿意行使武力解决国际纷争，国家的外交政策遵循着“非暴力”的和平理念，这是日本在海外投资、合作生产，极易进入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基本原因。

战后“和合文化”所表现出的“小日本主义”的路线，实质上体现着“大日本主义”的战略目标——日本不仅要做大经济大国，而且要发挥“政治大国”的作用、在地区安全方面谋求主导权。上述历史事实表明，为达到“重新崛起”的目的，日本巧妙地利用了美国“强加”的“制度化”的和平宪法，同时借美国保护之力，不断调整和变革，以求最大程度地利用当下国际秩序和国际机制。这种“和合文化”所具有的战略取向，被美国学者肯尼思·派尔称作尽量“以最小的代价谋取最大的成果”。为达此目标，日本在每一次国家发展的关键阶段，通过集体认同和构成性规范的建构，谋划着国家的长期利益。这也透射出了日本在未来时日国家战略目标调整与变化将在“和合文化”的常态下循序渐进地不断推进。

三 民生国家与普通国家

(一) “普通国家”目标与“制度性法律规范”的冲突

冷战结束，美、中两国的实力变化及其国家战略调整，成为影响地区乃至世界力量结构变化的两个关键因素，也成为日本国家战略调整的必要条件及直接原因。日本的地缘战略选择，正是基于这两条主线，是对美、中国力及其战略定位的反应。面对亚太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依据国家实力，日本已经在调整其地缘战略，重新界定自己的国家利益。

^① 彼得·J.卡赞斯坦：《文化规范与国家安全》，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73页。

可以说,在国际体系发生变化的关键时刻,现实主义理论对日本的对外政策选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也要看到制度化规范与构成性规范的文化因素仍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近些年中国的影响力不断上升,与此相对照,日本经济却表现出长期的萧条和沉寂。实际上,世人忽视了日本正沉浸于谋取“重新崛起”的大国之梦。美国日本问题专家肯尼思·派尔在2007年1月出版的《日本崛起:日本实力和意志的复苏》^①一书中告诫世人:日本已重拾自信,正在重新崛起。派尔在解释日本崛起的表现时明确指出:日本正在抛弃已实行半个多世纪的和平主义和孤立主义,开始准备让自己成为21世纪国际政治中的一名主要角色。这种崛起,“不仅仅是指经济状况和国家实力复苏意义上的,而是全面的、全新的,包括战略理念的更新,包括欲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上‘有所作为’的意志和目标之复苏等等”。

二战以后,日本走上了“吉田茂选择”的道路。在“重经济、轻军事”的口号下,推动实现“民生国家”的目标。^②到60年代末,日本实现了经济腾飞,步入了经济大国的行列。进入80年代,随着经济的急剧膨胀,日本政界逐步形成了以军事力量的扩张为基点迈向政治大国的外交目标。90年代以来,日本通过美国的两次海湾战争及“九一一”事件,在“国际贡献”的名义下,先后向许多国家和地区派兵,完成了一系列的法律和行动,开始了向“普通国家”推进的历程。

日本“普通国家”目标,源于20世纪80年代中曾根提出的“战后政治总决算”。但当时的国际社会和日本国民都未能接受。这表明日本政府在推动由“民生国家”向“普通国家”目标转变的问题上,与制度化规范及构成性规范的文化因素发生冲突,这些规范当时对“普通国家”目标实现显然具有阻碍作用。

随后,90年代初期小泽一郎的“普通国家论”^③、21世纪初安倍晋三的“摆脱战后体制”,都是这一目标的延续。

^① Kenneth B. Pyle, "Japan Rising: The Resurgence of Japanese power and purpose", public Affairs, January 2007.

^② “民生国家(civilian power)论”的代表者为著名记者船桥洋一。其主张反对日本成为军事大国,应把日本发展成为全球性民生大国。参见:船桥洋一编「日本战略宣言—シビリアン大国をめざして—」、講談社、1991年。

^③ 小沢一郎「日本改造計画」、講談社、1993年、117頁、123頁。

在纪念宪法 60 周年的声明中,安倍称由美国在战后一手打造的和平宪法已经过时了,急需“大胆的重新审视”,尤其是要赋予日本拥有国家军队的权力。在现有宪法的规定下,日本没有参与“集体防御”(collective defense)的权利,无法在军事上支持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他迅速将“防卫厅”改为“防卫省”,宣布五年之内完成宪法的修改,并继续推动“自卫队”向“自卫军”转变。日本在野党认为根据《自卫队法》第 88 条规定,对于行使武力,“限制合理必要的判断”有可能会随之被取消。^①

2007 年 5 月 14 日,日本国会参议院通过了有关修改宪法程序的《国民投票法》。国民投票法规定国民投票仅限于修改宪法,但该法在颁布三年后方可实施。2010 年 5 月 14 日该法开始生效。据 2010 年 5 月 18 日《读卖新闻》报道,日本首相鸠山作为宪法修改的支持者,对于这一法案的生效给予认可,副首相菅直人也主张有必要修改宪法。^②

由此看来,这种急于摆脱战后“和平宪法”的制度性规范捆绑、通过塑造国民集体认同,由上至下地推动修改宪法的意图越发明显。日本所谓的“普通国家”化主张,具有很强的军事大国化意图。日本加强在亚太地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与澳大利亚的军事同盟关系,尤其是强化日美同盟及实施导弹防御计划,已经导致日本周边国家的担忧。修改宪法,推动行使集体自卫权,表明日本要抛弃“民生国家”的政策理念。

(二)“普通国家”的目标与“构成性社会规范”的改造

目前,日本政坛执政党的政治理念大同小异,都赞成将国家“普通化”作为政府的施政目标。日本国民修宪的集体认同接近形成。这种构成性社会规范的变化,为执政党推动修宪活动奠定了社会基础。

在宪法修改的民意方面,以往的民调显示,虽然支持宪法修改的数字不断上升,但是,对宪法第九条的修改,支持率始终很难过半。2007 年 1 月 4~10 日,日本政府调查显示:赞成宪法修改的国民为 45%,不关心的人群为 2%,而反对修宪的达 53%。与以往相比,赞成修宪的国民有越来越多的发展趋势。2009 年鸠山内阁上台后,赞成修改宪法

^① 「しんぶん赤旗」2006 年 11 月 4 日。

^② 「読売新聞」2010 年 5 月 18 日。

的人持续上升。据2010年5月1~6日的日本政府调查显示(如下图):赞成宪法修改的国民达63%,与2007年相比,上升了10个百分点,不关心的人群为8%,而反对修宪的为30%,下降了20多个百分点。这表明,日本国民对于修改宪法的集体认同正在形成,日本政府通过强化国民的集体认同消除制度化规范束缚的目标基本实现。修改宪法要在议会中获得三分之二以上赞成票,同时需要日本国民的集体认同,可以说,目前已具备了必要的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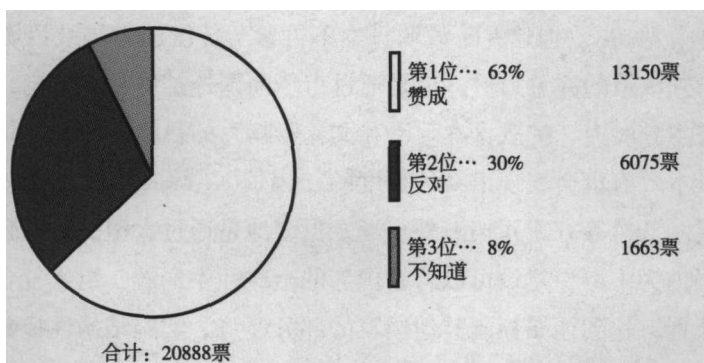


图1 2010年日本宪法修改国民舆论调查

资料来源: <http://polls.dailynews.yahoo.co.jp>, 百分率为四舍五入值。

当“制度化规范”的“约束力”成为“普通国家”战略目标的障碍时,日本政府通过国民集体认同这种社会规范的改造,转而达到推动制度化规范“和平宪法”的修改目标。这种集体认同作为一种社会规范,不是自发形成,而是日本政府有意地利用公共宣传影响着社会舆论的共识。

正如日本前首相中曾根所言,“日本要摆脱附庸国家地位,重建自信,与美国平起平坐”,首要的是推动国民“在思想上形成转换”。目前公众舆论及国民的集体认同已经倾向于修改“和平宪法”这一制度化法律规范,可以说,这种“构成性规范的文化因素”将会对未来的日本外交与安全政策产生巨大影响。

四 国际主义与亚洲主义

(一)“亚洲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

日本长久以来“危机意识”突出。在对外交往的事务中,“任何涉

及日本个人命运的外交事件，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整个日本深深地卷到事件中，这种行为特点被称为日本的‘母性家族国家本能’^①。表现为媒体与公众对于国内外发生的事件更具怀疑、敏感的态度。这种文化心理，塑造了日本对外政策的“谨慎与隐蔽”的特征。日本的领导者正是利用本民族“危机意识”的心理，巧妙地应对国内外环境变化的压力，引导日本的对外政策适应国际社会的变迁。

自二战战败以来，日本对于走向军事大国、推行海外扩张一直保持着某种“矜持”。但这并不说明日本不再参与传统的大国政治游戏。日本的对外政策的注意力更多地是通过市场向国外扩展它的影响，寻求强化经济主导能力、扩散日本政治和文化影响力的目标。但即使是经济方面，日本政府也会表现出某种程度的“谨慎”，政府不只是通过经济援助与技术扶持等方式开拓海外市场，更多地是通过大型的跨国公司，以日本国内为中心，建设可以跨越国界的全球性生产链，组建复合型工业生产流程，达到能够控制其他国家的部分经济、实施结构性控制的对外目标，从而使国际社会更多地认可日本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方面的影响力。在全球化、区域化不断推进的当今世界，尤其是近年来东亚地区整合速度加快、中国的崛起与两岸迅速融合，更使日本的“危机意识”陡然提高。日本不可避免地要寻求回归“亚洲主义”的外交路线，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重新出现回归“亚洲主义”的呼声。^②

21 世纪初以来，日本提出要建立一种地区层次上的“东亚共同体”的理念。2009 年上台的鸠山政府提出了“东亚共同体”战略构想。这一战略不是通过军事平衡达到外交目标，而是在经过历史曲折之后，日本要重返亚洲。这种外交的真实目的，是日本作为“亚洲大国”的身份认同不仅要在日本国内、也要在国际社会获得承认。这种政策安排，不仅可以消除日本在地区安全合作中过分追求国家权力的印象，也可以淡化日本多年来追求的自主性的国防战略。

① 潘一禾：《文化与国际关系》，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142 页。

②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以新民族主义的抬头为背景的亚洲主义死灰复燃，这种亚洲主义情结，一方面，宣示对美不满，另一方面，其亚洲主义的观念仍是以否认日本侵略历史的亚洲观。参见：盛田昭夫·石原慎太郎「「NO（ノ一）」と言える日本」、光文社、1989 年、12~21 页。

事实上，战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日本的“自卫”能力得到了飞跃式的提高，“自卫”与“进攻”能力之间已经没有区别。日本早已不是也不愿意成为亚洲的“民生国家”，但又不明言成为亚洲的“政治与军事大国”，在“普通国家”的外衣下，通过“东亚共同体”理念，日本试图将日美同盟这样的双边军事同盟的关系，隐藏于亚洲区域组织之中。这样既可使亚洲成为日本施展军事与政治抱负的重要平台，也可以使这一区域成为权力国际均势与国家行为得以约束的国际机制场所，达到牵制中国影响的扩大以及两岸关系发展的效用。这是现实主义理性国家追求国家权力与利益最大化的基本诉求，但是日本外交政策关注的“亚洲主义”明显与日本国内文化的“脆弱性”发生强烈碰撞。

（二）“构成性社会规范”对“东亚共同体”目标的制约

本尼迪克特将日本的文化称为“耻感文化”，认为“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真正的罪感文化则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来做善行”^①。与西方的基督教罪感文化相比，这种文化的差异体现在对外政策中。奥斯威辛与广岛几乎成为日本有别于德国的对外政策的重要坐标。德国公开反省二战中的罪行，而日本对二战中对其他国家民众进行屠戮的角色进行掩盖，却不断向全世界与本国国民宣传受到美国核伤害的经历。日本二战中的罪行及其不愿“服罪”的态度，使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处境一直被动。可以说，这是日本“耻感文化”在国际社会的外交实践中的具体反映。

这种文化体现出自我为中心的“文化狭隘性”、不尊重历史事实的“道德缺失性”及其无法获得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脆弱性”。其外交模式，必然会遭到周边国家的抗议与国际社会的冷遇。这种外交政策所推动的目标是要加强区域相互“依赖”，而所要相互依赖的国家都是20世纪上半叶日本曾经进行过军事征服、领土占领、民族屠戮的国家。在这些国家看来，今天的日本外交战略不会再去追逐军事扩张、土地占领，其外交重点集中在增强国际市场主导权方面，努力使区域内国家依靠日本的产品、技术援助与经济扶持。但这一做法仍被理解为日本不是努力扩大区域共同体的发展，而是单方面的增强日本地区领导权。换句话说，

^① 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54页。

正是日本国内文化的“脆弱性”与对国际社会的“依赖性”发生了矛盾，最终也削弱了日本“东亚共同体”的战略。

此外，“东亚共同体”的战略目标与“内外有别”的集体认同模式相冲突。所谓“内外有别”的集体认同模式，表现为日本“自我”与“他人”的集体认同文化的差异上。古代日本人的生活，大都是以村落或某一地区为单位，与外界接触较少，形成了“内外有别”的思维定式。这种意识直接影响着日本人的交际行为模式与思维取向。在日语中，常有这样的表达内容，如“うちの人”、“うちの会社”等等。这种“うちの……”的表达方式，通常是指家人或关系亲密的人，以此为单位，形成一个“内部的圈子”。在这样的圈子里，个人要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一旦自己与集体的主张相冲突时，最终要服从集体的意见，遵守集团订立的方针。而不属于这个“圈子”的人，则被看做“外人”，理所当然视之以“疏远”的关系。^①这种“内外有别”的文化意识及其集体认同的规范原则，一方面，造就了日本人注重集团的团队精神，另一方面，在一致对“外”方面，表现出表面“暧昧”、内在“排斥”的特征。总而言之，“内外有别”的集体认同模式，对于日本回归“亚洲”具有消极的影响。

在日本看来，日美同盟当属于“自我”关系，而与亚洲其他国家关系应是“他人”的层次。在区域合作中，“自我”关系将会优先于“他人”关系。这种潜藏着的文化意识，必然会带来国家利益界定的消极的政治影响。日本希冀借助日美同盟的“自我”关系成为推动亚洲区域合作机制即“他人”关系的主要动力，这实际上与亚洲的集体认同相互矛盾。亚洲国家普遍担心区域一体化会导致亚洲国家的主导能力受到削弱，因此，一直警惕区域外大国的介入与主导。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在联合国没有授权的情况下，小泉首相主张“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采取断然措施加入支持美军行动当中”^②。伊拉克战争表明，日本抛弃了“联合国中心主义”的“国际主义”路线，强化日美军事合作的“自我”关系，意图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

^① 参见王秀文、孙文主编：《日本文化与跨文化交际》，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164~165页。

^② 久保弘之「命懸け守る国益」、「産経新聞」2003年3月7日。

与100多年前“脱亚入欧”相比，现在日本提出回归“亚洲”，可以说，这是国家战略上的巨大改变。但在日本是否回归“亚洲”方面，表现为区域“依赖”与文化“脆弱”的冲突。如果说，制度化法律规范制约了“大日本主义”与“普通国家”政策目标的实现，那么，构成性的社会规范则成为制约着日本回归“亚洲主义”的重要的文化内在因素。“东亚共同体”作为日本重归“亚洲主义”外交政策的表述，是历史的进步，至少表明了日本对于“亚洲”重要性重新认识的某种程度上的集体认同。

五 结 语

日本作为一个理性的国家，置身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之下，其对外政策理所当然地受到现实主义理论的影响。在全球化与区域化相互依赖的今天，自由主义理论强调的制度与机制的作用也渗透于日本对外政策之中。但这两种理论都忽略了日本对外政策的文化层面的制度化规范与集体认同的因果影响。正是日本特有的文化，决定了其外交政策的特性。任何国家的对外行为，都是不断增长的经济力、政治力与文化建构的共同产物。用文化视角分析日本的对外政策，并不是将文化当做决定外交政策的唯一变量，也不是要抛弃权力、利益与制度、机制的合理解释力，而是将文化作为一种分析路径，达到补充与修正的作用。当然，庸俗的文化主义过分强调日本外交政策的特殊性，这种文化分析法，无法全面深入地对一国的对外政策选择进行分析。事实上，理性主义利益驱动的分析方法与文化驱动的分析方法并非是完全不相容的。

在日本的对外政策调整的过程中，制度化的法律规范文化因素制约了“大日本主义”与“普通国家”目标的实现，而作为构成性社会规范的集体认同正在形成有利于这一目标实现的环境。但在“亚洲主义”方面，构成性社会规范的集体认同的文化因素明显制约着“东亚共同体”目标的实现。目前来看，作为法律规范的“和平宪法”明确规定的反对以战争作为外交政策的手段、永远放弃以国家权力发动的战争和武力威胁或以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等内容，仍然是难以跨越的屏障。

可以说,这种制度化的法律规范文化因素对于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的影响,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当然,日本政府力图改变这一制度化的法律规范束缚的努力也是“绝无仅有”。自1947年5月3日开始实施“和平宪法”以来,日本一直是在“修宪”与“护宪”的争论中走过来的。战后60多年来,日本掀起了五次修宪浪潮。上世纪50年代鸠山一郎、60年代岸信介、80年代中曾根康弘、21世纪初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主导了五次修宪高潮。50、60年代根深蒂固的“和平主义”思想发展至今已经受到了极大的削弱,日本政府与国民已经达成了某种默契,安全方面的一系列禁忌正在被打破。但我们不能就此断言日本会重走“军国主义”的老路。反对军国主义的社会规范在日本仍旧存在,国际舆论对于日本政府重塑国民认同的意图也会形成巨大压力。日本在“大日本主义”、“普通国家”、“亚洲主义”等外交政策的转变中,最终还要取决于制度化的法律规范与国民认同的构成性社会规范之间的复杂互动与博弈,取决于国际社会环境与日本的政治、经济与安全力量的互为因果的关系。

总而言之,日本外交政策的战略选择体现了日本文化与政治、经济、安全的综合性特征。“在这样混沌的时代,持续混乱的日本社会与外交”^①,其文化也许能更好地诠释今后的日本会走向何方。日本文化作为不同历史时期外交变化的内在变量,保持了日本对外政策的特有属性,维持了这一系统稳定的整体结构。日本文化就像一个没有蜘蛛的蜘蛛网,在日本外交政策这一复杂的系统里,有时起到“牵制”或者是“支撑”的作用。

(责任编辑:林昶)

① 村田良平「何处へ行くのか、この国は」、ミネルヴフ書房、2010年、2頁。

略の利益実現に関わるものである。21世紀になって以来、日本のEPA戦略の実施によって、素早く東アジアひいては全世界で独自のEPAネットワークを構築したが、しかし、このEPAの繁殖は、日本企業がその優遇政策を自動的に利用し国際取引を行うことにつながらなかった。JETROのアンケート調査及び国家間の比較によれば、日本企業のEPA優遇政策の利用率は国際レベルより低い。日本企業がEPA優遇を充分利用できなかった原因は多岐にわたるもので、日本は一連の改善措置を模索してきた。

文化の視点から見る日本の外交 政策における戦略的な選択

巴殿君

日本の近代史とは、即ち、小国主義対大国主義、民生国家対普通国家、国際主義対アジア主義という拮抗する外交理念の消長の歴史であり、日本の外交政策の変遷も基本的にそれに沿ったものである。制度化された法的規範は、日本の「大国主義」と「普通国家」という目標の実現を制約しながら、社会的規範とされた集団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は、その実現のために有利な社会環境を整っている。ただ、アジア主義に関して言えば、社会的規範とされた集団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は、「東アジア共同体」という外交目標を明確に制限している。文化規範は、日本の外交政策の実践を制約しながら、日本の外交政策に対する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形成にプラス的な役割を果たし、さらに日本の将来の外交政策に関する政治判断に対しても、目に見えない影響を与えている。

日本の介護保険改革及びその動向について

宋金文

日本では、2000年に介護保険がスタートし、10年間の実践と模索を経て、現在、基本的に平穩で順調に運営され、その役割もますます大きくなりつつある。しかし、あらゆる新しい出来事の誕生と同じように、この制度も一連の改革と改善の過程を経てきた。本論では、主に2005年介護保険法改正後、日本の介護保険制度が給付重視型から予防重視型へ転換する背景・原因・措置およびその意義を検討し、高齢化社会の到来を迎えようとする中国に有益な示唆を提起したい。